

# 论都市边缘农村社区的都市化

——广东都市化研究之一\*

周 大 鸣

本文以三个个案为例，探讨了都市边缘农村社区的都市化及其相关的问题。选择的三个个案各具有代表性：南基村是亦城亦农的代表，鹭江村是漫长的都市化过程的代表，村中之村则是外来人聚居区的代表。最后就这一类社区中普遍存在的两个问题进行讨论。其一为什么这类社区是城市综合治理的关键地区？主要原因是行政管理不统一，居民住房面积太大，和由于社区生活方式改变太快而带来的文化适应问题。其二是为什么这类社区都市化过程特别长？主要原因是户籍管理制度的城乡分离，土地管理制度的城乡差异，以及无规划、高密集的村落难融入都市之中。

作者：周大鸣，男，1956年生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。

本文所指“都市边缘农村社区”，既是中国都市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区类型，亦是中国特有的土地征购政策、户籍管理政策体系下的产物。这些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，兼有城乡生活方式的特征，因而不同于一般概念中的郊区或农村。比如人口密度高，人口异质性增强；仍保留一些农业生产，但农业生产已不是主要的经济生活方式；全部的耕地或部分土地被征用，但个人仍拥有住宅地或少量的自留地；社区中一部分人成了城市人（城市户口），一些人仍为农村人；个人的谋生手段开始多样化。

都市的扩展，或新都市的设立都需与这类都市边缘农村社区发生联系；都市的管理和都市的综合治理更不能忽视这类社区。可是，过去学术界对这一类社区关注甚少，科学系统的研究更为少见。笔者从1990年开始对都市边缘农村社区进行调查，本文是调查的成果之一。

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，都市化的过程一直非常缓慢。从1949—1978年，有关政策主要是限制城市的发展，城市与乡村的界线相对稳定，都市边缘农村社区也不那么引人注目。1978年以后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，都市化急剧发展。如珠江三角洲从1957—1978年的21年间城镇数量保持不变，一直是30多个；而从1978—1986年底发展到252个，其中中等城市以上城市达7个；<sup>①</sup>从1987年至今则是城镇普遍扩展的时代，中小城市升级，县改市、集镇普遍更新。一方面是新的城镇建制的不断设立和旧城镇的扩展，另一方面是新的工业区、开发区、厂矿的兴起，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社区处于城市的包围之中，并逐渐都市化。这些在都市化直接冲击下的农村社区生活概貌怎样、怎样变迁、怎样适应呢？下面以广州的几个个案为例。

\* 本课题得到Wenner-Gren Foundation For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资助，此为“广东都市化比较”项目研究论文之一。

① 《广东省小城镇资料汇编》1987年，广东省统计局。

## 一、“说是农村人又是城市户口，说是城里人 又不像城里人”——南基村

南基村属于广州黄埔区南岗镇，地处城乡结合部，广深公路从北面穿过，东面是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，南面是黄埔新港，西面是黄埔电厂。南基村人自称“说是农村人又是城市户口，说是城里人又不像城里人。”这种亦农亦城概括了这一社区的基本特征。

南基村属下有10个经济合作社，共1700户，4080人；分为三个自然村，由小河涌分隔开；一为南湾村，包括7个经济合作社（习惯称小队），人口2500人，位于北部，南基村村委会设在此；一为西基村，第八、九社（小队），1000人左右；一为东基村，500人，与西基隔岸相望。从70年代起到1988年，周围单位开始在南基村大量征地，出现了大批农转非，1978年有250多人，1984年转800多人，1988基本上都转为居民户。一方面，人们逐渐成为城市户口，另一方面突然获得了大笔资金，代价是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。

南基村的都市化是突然的，面对这种突然的文化变迁，无论是个人还是社区都面临着适应的问题。

南基村委会采取这些办法：一是对土地征购费进行合理分配以防止分光用光，个人仅得安置费和青苗费，一部分由小队掌管，一部分由村委会统管；二是规定了资金的使用方法以防止挥霍浪费，将资金一分为二，一部分存入银行作资金（利息发给个人），一部分用于投资；三是保留部分土地不准被征用，作为自身发展用地；四是把投资的利润用于社会福利和其他公益事业。

南基村也建立起自己的社会保障制度：一是在三个自然村分别建起了幼儿园，两间小学；二是实行奖教奖学制度，学生统考平均80分以上对任课教师进行奖励，凡考上高中、大学的也给予奖励，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；三是与广州工人医院合作办起了南基医院，方便村民就诊；四是办起了南湾公园，是广州最大的乡村公园；五是办老人娱乐院；六是按人头发生活费，每人每月有200—300元（按工分分配，最高为10分）。

由于南基村的资金雄厚，所以其社会保障的福利是相当不错的。不劳动生活也不会成问题，但也把村民们牢牢的束缚住，怕失去这些福利（有正式工作的人不能享受这些福利）。现在实行股份制，各种收入都按股份分配。股份制与工分制略有不同，股份制是按年龄配股，年龄大股份多（最多为8股，50—60岁8股，60岁以上7股），因此年青人意见比较大。

南基村集中了部分土地征购费在广深公路旁边办起了工业屯。工业屯内先后投资了3000业万元兴建标准厂房和仓库。已有14家企业在这里落户，均为“三来一补”企业和“三资企多”。南基村村委会主要收入就是出租厂房和仓库，以及其他管理费，村委会把收入都投入到集体的福利事业，而村干部却比较节俭，没有豪华的小汽车和办公室。

南基村的三个自然村由于各自条件不同，所以采取了不同的适应策略。东基村的村民大部分原为水上居民，50年代开始定居，人平耕地仅一亩。平时耕地，农闲时出海打渔，家家都有船，以渔补农。但是由于污染日益严重，珠江中的鱼越来越少，渔业占的比重也就越来越少。1988年除保留45亩耕地外，其余的土地全部被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征用，每亩征地费4万元，另有安置费和生活过渡费。队的经济与村是分开的，收入各归各。其收入主要来自这么几个方面：一是利息，将部分土地费和安置费作为固定基金存入银行，利息分配给个人；二

是出租土地，将自留土地租给一家公司，每平方米30元、每三年递增5%；三是投资建仓库出租（原有的仓库已被征购）。这三项收入可分配给社员每年每人2000—2500元，此外还有部分收入用于队里的公益事业，如幼儿园、小学等。全队总人口400人，有劳动力300人，主要从事的工作有：1. 在开发区做临时工，尽管开发区必须优先招聘南基村的人，但是一般不愿意做正式工，因为做正式工要退还安置费，这部分人主要为年轻妇女；2. 做手工业，到开发区的工厂拿零件在家里组装，赚点手工费，这部分人主要为家庭妇女；3. 摩托车载客，全村有50多部摩托车，多数去开发区载客，平均每天可以赚20—30元，这部分人为年轻男子；4. 做小生意，如开士多、小食店等；5. 种菜，开发区征用的地一部分还没有用，于是一些年长的人就利用空闲地种菜；6. 养猪，有20来户人（全村150户）养猪，多的一户养100多头，饲料来自开发区的食堂和酒楼。

西基村与东基村情况相似，1978年以前是以农业为主、渔业为辅，开发区建立之后全部耕地被征完，村民转为城市户口。西基由第八第九社组成，人口比东基多一半。西基的集体收入有：一是投资建了两座厂房，有4000平方米，出租每平方米每月7元；二是投资100万（其中集体占60%）挖沙船，每年收入超过100万；三是固定存款吃利息。西基人除了从事东基人的那几类工作以外，比较多的人买货车（进口自卸车，每台10万元）和货柜车（一台车30万），并个人集资购买挖沙船（130万）。

南湾村包括七个经济合作社（1—7社），人口2000人，此外有户口迁出还住村里的500人，外来劳动力2600多人。南湾人口多而被征用的土地少，因此没有东西基村那么多征购费，集体分配的钱也少一些。如第二社1991年人均分红2000元左右。南湾村的征购费虽少，但有土地资源，有400多亩耕地和大片的坡地，因此南基村的工业屯就建在这里。此外南湾村自己搞了工业区，建了一些厂房，已有11家企业，多为港商投资的。村里有50多辆汽车，20%的家庭有摩托车，家家建了楼房。

从三个自然村的适应情况看，条件最好的是东基村，地处开发区的腹地，起步资金也多，但并没有迅速崛起，而条件相对差点的南湾村反而发展最快。

南基村人的生活方式已有了较大的变化，除了楼房、电视、冰箱等家电普及外，电话、煤气也渐渐被人接受。年轻人变化最快，骑摩托、着名牌、上舞厅、唱卡拉OK。年轻人结婚，家具全是到商场购买，不愿意使用自己打制的老式家具。传统的习俗仍然保存，每月的初一、十五要烧香敬神，过节要拜神。在装饰漂亮的客厅里均设有神龛。

南湾总计有外来民工2600多人，80%以上是女工，主要来自湖南、江西、四川、广西等地。也有省内来的，比如有一个厂是汕头人办的，它主要招收汕头民工进厂做工，为的是语言相通，办事方便。由于外来人员较多，对本地治安情况有一定程度的影响。不过有些来自四川、湖南的打工者，虽然起初语言不通，但慢慢地他们也学会一些本地话，与当地居民尤其是与一些出租房屋的房东关系比较融洽。

南湾村对村容村貌及道路、下水道的“市政”建设比较重视。还投资兴建了幼儿园和村小学，南湾公园也座落在这里。

南基村的人衣食住行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。生活条件的优越，使得他们并不向往居住在拥挤、嘈杂的城市，因为比较熟悉源亲的生活环境，村内人彼此认识，且住房又不同于城市，这样一家一幢楼，很清静、很宽敞、很舒适、很自在。人们手头上有钱，交通又很方便，只要愿意，随时都可以进城办事和娱乐，而日常用品不出村也可以买到。1988年农转非时，大部

分人不愿意转户,最后只得以不影响参与社里的分配为前提才转户。这样,又导致1988年前转户者的意见,有的人宁可放弃正式工作回社。因此,虽然大部分人已转为城市户口,但仍然是旧的农村行政组织管理之下。也因此,南基村人难以彻底的城市化,如1988年,东西基村人已全部转为城市户口,但是1988年后又有上百人是农村户口,这些人是通过结婚迁移来的、以及新生的小孩(其母是农村户口)。

由于年龄的不同,适应策略也不同,中老年人对现在的生活很满足,因此采取的是求稳的投资方法,如存银行、出租土地和厂房;年轻人对此很不满,认为不要怕担风险,要办自己的产业,但是保守的人多,要通过一项新的投资计划相当困难。代沟是明显的,年轻人与中老年人相互抱怨:年轻人抱怨老一辈人是守财奴,制定的分配政策仅对他们有利;中老年人则说年轻人没吃过苦,只会吃喝玩乐,小事不愿干,大事又干不来。外来人仅凭穿着就可分辨,中老年人大多还是过去那种农民的打扮,更老一点的人还保持着水上居民的习俗(尤其是妇女);年轻人就时髦多了,男的穿牛仔裤、波鞋,女的烫发化妆。

总的来说,南基村的都市化过程是顺利的,南基村人对都市化变迁的适应也比较快。所以这些年来多次被评为广州的“文明村”、“标兵村”。

## 二、漫长的都市化过程——鹭江村

鹭江村,隶属于广州海珠区,现在已成为名符其实的“都市包围中的村庄”,离广州市内的两条主干道新港路和广州大道的立交桥仅200米。大概是该村距中山大学较近的缘故(1952年以前为岭南大学),从40年代起就有学者对鹭江村进行调查和研究,80年代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又进行了多次追踪调查。这既使得鹭江村扬名世界,也留下了难得的长达近半世纪的一个乡村都市化的完整资料。<sup>①</sup>笔者自1978年进中大以来,经常去鹭江村散步、购物,也目睹了该村十几年来变迁。综合这些材料,可以看到鹭江村所经历的漫长的都市化之路。

### 1. 田园风光——40年代的鹭江村

杨庆堃等先生描述的40年代的鹭江村,虽已受到都市经济文化的影响,但仍保留着乡村特色的田园风光。1948年时,鹭江村距广州市约8公里,行政归番禺县,人口1100人,耕地1200亩,人均1.08亩。村民以农业为主,约有75%的家庭过着以农业为主的生活,还要兼副业如绣花、进城做工、作小商贩以补农业收入之不足。当时交通不便,只有1.5米宽的泥泞小路通广州,走水路要多绕5—6公里。

不仅在经济上还保持着以土地为生的自给自足的乡村特色,而且在社会制度中亲属关系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宗族组织是亲属关系的主要形式,当时车、莫两大姓决定着鹭江村经济社会的主要方面。姓氏决定着一个人的经济、社会地位和群体的划分。家庭仍然是个人的经济、宗教、教育与娱乐的场所,以及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单位。

40年代的鹭江村具有明显的乡村社区特征,但由于靠近广州,受到了广州都市文化的辐射。村里人可以看到广州当天的报纸,进城做工,贩运物品,种植蔬菜供应市里换取其他消费品;宗族的势力开始削弱,政府的权力上升。

<sup>①</sup> C.K.Yang, 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ty Transition. The M.I.T. Press 1959; 刘耀荃:《鹭江村的权力结构》,岭南大学社会学系学位论文,1950年;广东省农村社会经济联合调查组:《广东省广州市郊区凤和乡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汇编》,1985年;郑德本:《城郊人口的社会流动研究》,《社会学论文集》,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。

## 2. 城市包围农村——50年代至70年代的鹭江村

在50年代以前，鹭江村与广州之间的交通落后阻碍了鹭江的都市化进程。自60年代开始，交通条件得到改善，一条18米宽的公路从村中穿过（新港路）。公共汽车开通了，村民们骑自行车到市区也方便，各类企事业单位也陆续迁入。鹭江村的都市化进程加快。

广州解放以来，尽管市区人口的机械增长受到严格限制，但仍然增长很快。为了缓和市区人口密度过高的问题，一部分企事业单位开始有计划的向近郊疏散。因此从60年代开始，就有许多单位迁入鹭江村的范围内，并逐渐把该村包围起来（单位仅占用耕地或坡地，而保留了原村民聚居点）。尽管企事业单位与鹭江村在行政、户口管理上是隔离的，鹭江村也相对独立和封闭，但是企事业单位的迁入对鹭江村原有的生活方式有较强的冲击。

首先，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，征地主要是用招工和转户来补偿的，因此鹭江村一部分人成了国家职工和城市居民，这部分人大多仍住在村里。其次，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，农业的比重不断下降，工商业比重大幅度增长。农业的结构亦发生了变化，水稻种植逐渐减少消失，而以蔬菜、畜牧、养殖为主。其三，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村民职业结构的变化，劳动力逐渐转移到第二、三产业。其四，生活条件有较大的改善，由于有大笔的征地补偿费加上工副业有较大的发展，生活、居住、医疗、教育等方面有较大的改善。

## 3. 是城市还是乡村？——80年代以来的鹭江村

自80年代开始，鹭江村的交通更为发达，新港路拓宽为38米，宽45米的广州大道亦兴建起来。又有大量单位迁入，可耕的土地已很少。在1985年，广州行政区划进行调整鹭江村也由原来的郊区管辖转为海珠区管辖，鹭江成了城市社区。

鹭江村的变化很大，首先由于土地征购费提高，也没有了招工，集体和个人都有了较多的起步资金，大量的集体企业、个体企业兴办起来。收入的增多使集体的福利和个人的住房都有了较大的改善。许多家庭都有多栋楼房，多余的房就用来出租。鹭江村先后办起了刺绣、服装、铸造、塑料、针织、汽车维修、钢窗制造等企业，并利用有利地理位置，沿公路办起了百货、饮食、食品、修理等服务行业。

人口结构有了较大变化，除了征地转户的外，还可以用钱买城市户口，因此城市户口者增加。村里的管理机构也发生了变化，成立了一个村民委员会和一个居民委员会，分管不同户口的人。人们的观念亦发生了变化，教育水平有了提高。

总之，鹭江村已具有了都市化的基本特征：1. 人口众多、密度高，现村内住的人口有2200人，密度为1300人/平方公里；2. 人口异质性高，除了原有居民外，还有迁入的城市居民、外来人口（没有本地户口）。这部分人来自全国各地，使鹭江村成为一个多元的社区。3. 职业的分化程度已相当高。4. 大众传播已普遍化。

为什么还要问“是城市还是乡村”呢？鹭江村里还有部分农村户口者，且而随着婚姻嫁娶仍会有农村户口的人迁入，此为其一；鹭江村原有居民相互的认同感较强，与广州大都市文化相比具有次文化的特色，此为其二；鹭江村的建筑基本上是无规划的，环境比较差，在短期内无法得以改造，此为其三。

## 三、村中之村——都市边缘农村社区中的外来人口聚居区

《广州日报》曾作过一个题为《城北正在崛起一座外来人城》的报导，描述了广州城北

城乡结合部的外来人。实际上，这在都市边缘农村社区中是一种普遍现象。笔者曾带学生调查过一个外来人口聚居区，访问了上百人（详细资料将另文发表）。下面简单地介绍一下。

这个村位于晓港河边，属于联星村，交通极为方便，海印大桥修通后，过桥就进东山区。晓港河两岸多为建筑材料的码头和仓库，需要大量的临时劳动力，因此这一带在10年前就有不少外来劳动力。随着码头仓库的增多，外来人也越来越多。据村里人和住在村里的外地人说，村里有5000多外来人口，对于这个数我们半信半疑，但不知为什么口径这么一致。看了一些外来人的住处以后，想来这个数相差不会太远。

这个村中村称为“四川村”，自然以四川人为主。大部分人是“泥水佬”，从事建筑维修、材料搬运等工作（实际上雇主请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）。他们白天出去，在街头、码头、仓库门口等待雇主，中午就吃一个盒饭，到天黑才回来。他们住在河边的临时房中，房子盖在堤上，所以都不太宽，室内面积不会超过10平方米。室内就象一个笼子，留下的空地不足一平方米。“笼子”有三层，每层有六格，每格大概有火车卧铺那么大，但没有那么高。一般都留两格放行李，住12—16个人。笼子是用砖头砌的，人睡觉只能从一头爬进去，然后用一块布挡住就不用挂蚊帐。室内仅一个小窗，闷热是可想而知。每个人每月还得交20元。广东省内来的人住得好一些，通常3—4人合租一室。

白天在外面找工不容易，运气好可以赚点钱，运气不好的话一挡事也没有。要拥有一个固定的地方等工也不那么随便，首先是相互之间要协调，经常为争地皮、抢生意发生打斗。其次要与城管人员搞好关系，有些地段的保安人员按月抽钱，最少5元以上。如果不交钱，轻者把人赶走，重者打一顿再送盲流遣返所。进盲流遣返所至少要罚款300元，没钱就要挨打，然后遣送回去。其三要受黑社会组织的欺负，一些黑社会成员按月、按天来收钱，收多少不等，如不交就可能有灭顶之灾。住在村里，除了交房租，还要交临时户口登记费，还有治安人员定期来收“保护费”。他们说这些保安人员都不是本地人，是从广东其他地方来的，他们不敢欺负本地人就只有拿外省人开刀了。

村里外来人口中还有从事其他行业的，如在集体、个体企业中做工的，做黑市买卖的，做生意的，在码头上做老板的，以及其他的租房者。这部分人一般是租村民的楼房，住房条件就好多了。有的一家租一套，有的合租一套。

村里人对外来人都比较同情，认为他们出门在外赚钱不容易。一些个体老板也反复强调他们对外来工不错，按件给钱，还要付医疗保险、住宿费。外来人对本地人很好，按他们的说法不友好也不行，因为“强龙压不过地头蛇”。相反，外来人之间比较难处，不同省的人、不同地区的人经常发生矛盾。曾亲眼看见一帮四川人之间的群斗，动刀、动砖打得头破血流。他们说四川人与湖南人经常发生群斗，主要是竞争生意和地盘。

村里办了不少工厂，有本地人办的，也有外来人办的。因为是民房作厂房，所以工作环境较差，房子的空间太小。在厂里工作的人都是外来的女工。有家服装厂，在室内摆了几十台衣车，几张裁衣台，空余的地方堆放着布料、成品，人经过都困难，室内只有几个小窗，近50个女工就在这里工作。村里沿河的地皮已租出去，主要是作建筑材料仓库，这些老板在空地上盖了不少房子，除了自用外就是出租。前面说的民工住房，大都属于这类。此外也有许多房客身份不明。

#### 四、影响都市边缘农村社区都市化的两个问题

都市边缘农村社区既是我国普遍存在的一种社区类型，又是问题比较多的地方，在此就两个主要的问题进行讨论。

##### 1. 是城市治安综合治理的关键地区

根据北京、武汉、广州等公安部门统计，城乡结合区的犯罪率和治安案件发案率远高于城市和乡村地区。因此笔者认为城乡结合部（既都市边缘农村社区）是城市综合治理的关键地区，理由何在呢？其一，都市边缘农村社区往往处于“三不管”地带。在一个村内，有数家甚至数十家国有的企事业单位，这些单位分属不同的条条管，相互之间联系很少，有的甚至矛盾很大，而当地政府也管不了。此外，村里的原住民也是半城半农，有不少家庭中有的转了户，有的没转户，村里既有村民委员会又有居民委员会。一个地方多种管理体制而缺乏统一的管理机构，变成谁也管不了谁。本地人都管不好，更不要说管好外来人口了。

其二，这类社区原居民的住房面积很大，多者3—5栋、少者2—3栋，且多为楼房，多的房一般都是出租。本来应该这类社区土地缺乏，可是闲置土地却很多，在村头村尾，在单位之间围墙的夹缝中，或者已被征购还没有使用的土地，这些地方就成为外来人口的聚居地。此外，一些留下来的自用地，由于没人耕种，或者是抛荒、或是请外来人承包。这些承包者往往就在地头搭个棚来住，一家老小都住在一起。所以这类社区，容纳了大量外来人口，而这些人口成份复杂，且移动性大，极难管理。由于外来人口，多是亲戚、同乡聚居在一起，因而形成了“村中之村”（或称城中之村），这为管理增添了困难。

其三，这类社区生活方式改变快，人们的文化适应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问题。一方面是失去了土地，改变了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，这种变迁是突然的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顺利的适应；另一方面突然获得了大笔的征地补偿费，人们怎样使用这笔钱呢，有的用来投资，有的用来挥霍一空。有的社区成功地运用了这笔资金，获得了更多的财富，并且建立了完善的福利事业。但是，由于个人不劳动也有生活保障，使得一些人变得无所事事。由于这些，有些社区生活出现了混乱，赌博、吸毒、嫖宿、偷盗等越轨行为增多了。

要综合治理这些社区，首先要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，改变过去多元管理的方法；其次要加强出租屋的管理，对超出规定的住房面积应该征税、或建立相应的制度；其三要加强对空闲土地的管理，坚决拆除违章的棚户建筑；其四加强道德风尚的教育，建设文明新村；其五加强投资引导，使得人们能尽快地适应新的生活。

##### 2. 加速都市边缘农村社区的都市化过程

这一类社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市化的过程特别长。南基村和鹭江村都很早开始都市化的过程，但直到今天还不能说已真正完成。都市化过程太长，既不利于城市的整体规划、有碍城市的景观，也不利于城市交通、环境、治安的综合治理。阻碍都市化进程的原因主要有三：其一是户籍管理制度，在我国长期以来户口是城乡二元分隔的主要屏障，采取严格控制城市户口的方法来控制城市人口的膨胀。在1980年以前要获得城市户口、吃商品粮是不容易的。通常征地会给予一定数量的招工转户的指标，但毕竟量少。80年代初开始，户口屏障被打开了一些缝隙，如允许自带口粮入城市户口、购商品房可以进户口、甚至还可以用钱买户口。南基村的东基、西基两个自然村在1988年因土地全部被征用，村民也全部转为

城市户口，可是没几年，又有了为数不少的农村户口者。因为，按规定户口跟母亲走，男青年结婚娶的是外省外地的农村姑娘，这样其子女只能是农村户口。加上南基村仍为农村管理体制，上一个农村户口就不难了。这样从户口来看，城乡户口并存的现象仍将继续下去。

其二是土地管理的问题，我国土地政策是城市土地国家所有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，这种不同的政策影响了都市边缘农村社区的城市化的进程。在1985年以前，土地征用的补偿费不高，村民还向往转为城市户口；但此后土地价格不断升值，社区和个人的财富增多，生活水平提高，村民怕失去参加集体分配的资格，就不情愿转户了。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城市居民没有住宅地，而农村居民有住宅地分配。90年代以来兴起的房地产热，土地升值拥有数栋自己的房屋这可不是笔小财产。加上城市户口已没有粮油供应，对于村民们来说转户已没什么意义。迫不得已转户，或者在转户之前抢建住房，或者以继续参加分配为条件。甚至有些过去已经转户、被招工的人，又辞退工作回村，或花钱转为农村户口。从花钱买城市户口到买农村户口，这种转变实在令人深思：户籍管理制度向何处去呢？

其三，高度密集的住宅有碍社区融入都市之中。都市边缘农村社区一般没有什么规划，村民建房都是见缝插针，房屋间的密度超过城市社区，房子一般高2—5层。这样的村子，没有什么单位、公司征购得起，即使有钱也没人愿意。象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片征地，可是西基和东基还是搬不动。这样，越来越多的都市边缘农村社区变为“城中之村”，要改造更新只能依靠村自己的力量。这样势必影响城市的整体发展。

责任编辑：谭 深

## 书 讯

△张琢著《中国文明与鲁迅的批评》已由台湾桂冠图书公司于1993年5月出版。全书约25万字。定价250元新台币。

△胡 荣著《社会学导论——社会单位分析》已由厦门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7月出版。全书28万字，定价5.80元。

△曾钊新、涂争鸣等著《心灵的碰撞——伦理社会学的虚与实》已由湖南出版社于1993年6月出版。全书27.2万字，定价10.40元。

△魏秋玲主编《国外青少年价值观》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1992年9月出版，全书29.8万字，定价6.90元。

△萧国亮著、袁 方审定：《皇权与中国社会经济》已由新华出版社于1991年12月出版。全书11.4万字，定价3.10元。

△由周晓虹著、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《走向社会的名片——公共关系理论与实务》一书已出版发行，定价6.80元。

△冯同庆、许晓军主编《中国职工状况——内部结构及相互关系》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93年8月出版。全书42.1万字，定价16.20元。

△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90489课题组著高等学校研究生教材《马克思思想史纲》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1993年4月出版。全书29.7万字，定价7.40元。

△刘崇顺、王铁著《大潮下的情感波动——变革社会心理透视》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93年4月出版。全书27.7万字，定价6.65元。

(张)